

晚清民国时期山西药号的 洋广药材经营研究

刘新龙 刘秋根

【摘要】晚清民国时期,山西药号重点经营洋广药材长途贸易,并以总分号的组织形式编织运营网,在禹州组建洋广药材公和社,在祁州被称为“广帮”。在山西药号经营洋广药材过程中,采购任务由广州、香港分号完成;运输过程中,天津、烟台、青岛先后作为海运接货地,胶济铁路开通后济南成为洋广药材陆运重要中转站;销售任务起初主要由祁州、禹州分号负责,伴随经济格局变化转由天津分号担任。山西药号的洋广药材运销具体由分号完成,而总号主要职能在于人事安排、资金管理、会计监督,其核心是接收支两条线提供采购资金并统管销售收入。这种经营方式可归纳为分号经营、总号结算,也即分号作为运营主体直面市场,总号充当资金结算中心保证财权控制。分号经营、总号结算是山西药号拓展市场的核心机制,对于理解明清长途贸易运营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晚清民国;山西药号;洋广药材经营;总分号组织;长途贩运

【作者简介】刘新龙,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邮箱:2331977386@qq.com(秦皇岛 066004);刘秋根,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邮箱:lqg321@126.com(保定 071000)。

【原文出处】《中国经济史研究》(京),2024.1.107~120

【基金项目】本文为河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资助“近代祁州药材市场与贸易研究”(项目编号:SQ2024149)阶段性成果之一。

晚清民国时期,山西药号重点经营洋广药材^①长途贸易,并基于业缘关系在禹州(今禹州市)、祁州(今安国市)等全国性高级药材市场^②结为药帮。同光年间禹州十三帮会馆创修时,有一通捐款碑落款为“山西药材社、洋广药材公和社”,捐款成员以晋商居多。^③1920年直隶实业厅称祁州药市中“山西帮之卖广药者,便为广帮”,^④这是笔者所见首次明确山西“广帮”含义的文献。1935年药学家赵焯黄介绍祁州药市中的“广帮,包括两广及外洋输入之品,然真正之广帮药商,往往不至,专经山西人之手而推销之,或由卫帮从香港而输致之,所谓广帮,恐徒有其名而已”^⑤赵氏实际已承认祁州中的“广帮”由山西人组成,侧面印证山西药号在洋广药材贩运中具有一定垄断地位。

民国时期,学界基本认同祁州药市中的山西帮整体以销售山西药材、西北药材、洋广药材三大品种

为主,而洋广药材经营者被称“广帮”,足以说明参与洋广药材贩运的山西药号实力之强,^⑥值得学界重点探究。1949年后学界亦较早开展相关史实整理,1960年已有《广誉远药厂史》出版,描述广誉远药厂前身广升聚、广升远药号的洋广药材经营状况。^⑦其后如韩洪文^⑧、孙泰雁^⑨、程雪云^⑩等学者分别从经营管理、发展过程、太谷广帮药店等角度介绍山西药号的洋广药材经营。另有学者在药市研究中曾兼论“广帮”,提到太谷商人在禹州被称“广货棚帮”。^⑪以上论述从不同角度推进了学界对山西药号参与洋广药材经营的认识,但囿于史料长期以史话为主,研究无法深入,^⑫至今尚未有专题论述。

近年来面对山西药商文献大量面世的新趋势,虽王学坤、刘新龙曾分别探讨广升远的广药销售过程与收入,^⑬但整体来看,学界对其关注度不高,相关

讨论仍不够充分。对山西药商和药号的深入研究,可以回应明清长途贸易研究议题、开拓经营制度史等研究的更深层面,故本文尝试使用所见药商文献专门分析山西药号的洋广药材采购、运输、销售等环节,探讨山西药号长途贩运洋广药材过程中所体现的制度安排。

一、经营洋广药材的山西药号发展过程

明清时期,全国性药材市场基本形成,各地区大型药市成为药材交易的主要场地。广州因长期在海外药材进口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①且自明代以来岭南本土药业愈加成熟,有清一代广东省各州府所产药材达676种,^②乾隆年间佛山“百货辐辏,而以药材为首称”,^③再加广东蜡丸技术创新解决了长途运输难题,广州、佛山遂成为华南药材批发加工中心。^④明嘉靖年间浙商“走广”贩运已涉及药材交易。^⑤道光十三年(1833)有报道称福建、山东、河南等14个省份的商人携带药材前来广州贸易。^⑥各省药商齐聚穗、禅等地参与洋广药材长途贩运,山西药号自是其中代表性群体。

康熙二十五年(1686)山西药号已将沉香、海南参等广地药材运至禹州销售,号称“洋货棚”,其后又出现太谷人组成的“广货棚帮”。^⑦《广誉远药厂史》亦称清雍正以前山西境内药铺已前往岭南采购药品。^⑧可见清前中期山西人的洋广药材贩运已形成一定规模。道光六年太谷广升聚现身禹州山西会馆重修碑刻中,^⑨广升聚还在道光三十年参与佛山山陕会馆重修捐款。^⑩这表明广升聚已通过设置分号的形式来

构建洋广药材运销体系,也说明支撑山西药号总分号体系的人事、财务、会计等经营制度已基本成熟。

道咸时期,经营洋广药材的山西药号群体愈加庞大,如太谷广庆和、广益亿、广源兴等药号先后在此阶段成立。^⑪咸丰十一年(1861)日昇昌票号提到平遥广成瑞、太谷广聚盛在广州从事药材业。^⑫同治四年(1865)太谷广庆和、广源兴参与祁州药王庙捐款,同治十二年至光绪五年(1879)太谷广升聚、广庆和、平遥云锦成^⑬在祁州山西药帮名录中占据榜首位置,^⑭同光年间禹州已有“洋广药材公和社”,清末民初祁州药市出现山西“广帮”。^⑮由此可见,山西药号已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祁州、禹州等地的洋广药材供应。

19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香港外贸地位愈加重要,^⑯山西药号为取得市场地位顺势增置香港分庄,直接采购进口药材,1885年广升远成立后,派蒋濮出任广州分号经理,往来于穗港之间,后于1916年正式设立香港分号,广誉远员工称“香港及广州实际是一个分庄的两个部分,广州分号……先成立,……历年广州一号(包括香港)所结利润总是十倍于其它各地”。^⑰1898年广庆和广州、香港分号掌柜由郭琳担任,^⑱1946年广升远广州、香港分号掌柜都是石茂林,且掌柜常驻广州。^⑲香港驻地机构越来越重要,但从经营时长、掌柜驻地与利润结算来看,山西药号的广州分号实际负责在粤具体经营过程。

1898年,广庆和广州分号称广庆亨、广升远等山西药号在穗港两地从事洋广药材采购活动。表1中广茂兴、广茂新都是太谷孔家企业,^⑳永春原是成立

表1 1898—1899年所见经营洋广药材的山西药号总分号驻地分布表

总号	总号驻地	分号驻地	分号驻地	分号驻地	分号驻地	分号驻地	分号驻地
广庆和	太谷	祁州	禹州	天津	广州	香港	河口镇
广庆亨	太谷	祁州			广州		
广升远	太谷	祁州	禹州	天津	广州	香港	河口镇
广源兴	太谷	祁州	禹州	天津	广州	香港	
广茂兴	太谷	祁州	禹州	天津	广州	香港	
广茂新	太谷	祁州	禹州	天津	广州	香港	
广茂生	太谷	祁州		天津	广州	香港	
广升蔚	太谷	祁州	禹州		广州	香港	
广恒懋	太谷	祁州	禹州	天津	广州		
永春原	祁县	祁州	禹州	天津	广州	香港	河口镇
延寿裕	平遥	祁州			广州		
万盛高	长治				广州		
万胜顺	长治				广州		

资料来源:据刘建民主编的《晋商史料集成》第11册(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14—366页资料整理。

于咸丰年间的祁县渠家产业。^④延寿裕又称延寿堂，是平遥第一家南下广州的药号，由平遥票号百川通经理庞良山开设。^⑤万盛高、万胜顺则是来自山西长治的广洋杂货商。^⑥曲沃乾育昶、襄汾泰丰永也南下穗港经营洋广药材。^⑦以上山西药号都以总分号形式编织了其运营网。

抗战时期山西药号遭受重大打击，广全聚会江宁方忠称日伪统治时期洋广药材业务减少了十之七八。^⑧1946年广升远天津分号提到经营洋广药材者仅剩其与广义生、广福正、广升聚等4家，^⑨山西药号的洋广药材贩运全线收缩。1952年广升远在“五反运动”后收撤香港等地分号，经过公私合营与广源兴等改组为广誉远药厂。^⑩至此，山西药号的洋广药材贩运基本结束。若从道光三十年广升聚参与佛山山陕会馆捐款算起至1952年，一百余年内先后有28家山西药号经营过洋广药材事业，列表如表2。

从地域来源而言，28家山西药号主要来自太谷、平遥、祁县，其内部组织结构虽各有特点，但总体而

言是按照总分号体系安排人事、业务，且根据地缘业缘结为“广帮”，在洋广药材贩运过程方面具有高度相似性。

二、山西药号的洋广药材采购过程

晚清民国时期，山西药号通过设置分号构建了洋广药材南购北售运营体系，其各分号内部又可按分工定位划分为三大部分。其中，广州、香港分号是采购端；天津、济南分号作为中转端，担任运输任务；祁州、禹州分号是销售端。总号则作为中枢，主要通过人事、会计等经营制度全面控制体系运转，并负责驻地周边区域及派驻地点业务。

(一)山西药号祁州、禹州分号制定水程

整个运营体系的开端是销售端所制定的水程。水程，又称水程折，其性质与采购清单相同，具有商情传递作用，又有事后监督对账功能。在水程制定的分工上，山西药号祁州分号负责祁州药市冬春水程，禹州分号负责禹州药市冬春水程，总号负责百泉（今辉县市）药市春季水程。如表3所示，1898年6月

表2 晚清民国时期经营洋广药材的山西药号

太谷	广升聚、广源兴、广聚盛、广庆和、广庆亨、锦全昌、广升蔚、广升远、广全聚、广茂兴、广茂新、广茂生、广升誉、广升裕、广义生、广福正、广益亿、广恒懋、晋茂长
平遥	广成瑞、道生堂、延寿裕、云锦成
祁县	永春原
其它	襄汾泰丰永、曲沃乾育昶、长治万盛高、长治万胜顺

表3 1898至1899年广庆和信稿中有关洋广药材采购事宜

发信时间	发信地与顺序	信件内容
1898.5.24	广州第8次信	咱两会冬季水程尚未接到，禹会来信报及生意淡极，就是行情亦与广不符，祁会生意亦难望佳
1898.6.8	广州第9次信	收咱祁会信四封，统来两号正副水程四页，所开花色照信采办
1898.8.1	广州第11次信	又接到禹来信一封，统来冬会水程一页，遵式采办。咱号祁会走烟之货，已办八九齐，此和记省江共发一百三十四件，亨记省江共发一百一十件，统去报价摺三页，又统去各项售货摺四页
1898.10.16	广州第13次信	咱号南北两会货，日前业已办毕，祁字和记（笔者注：广庆和）共办二百一十九件，成本实银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五两八钱二分；亨记（笔者注：广庆亨）共办一百八十七件，成本实银一万零二百六十九两五分；津字共办货十三件，成本实银三百零六两四钱二分；禹字共办货三十九件，成本实银三千四百八十三两四钱六分。至于结账，亦皆分寄各处矣，至祈勿念是荷
1898.11.4	广州第14次信	今挨次收到拾二次信一封，统来泉字水程一页，照信采办
1898.12.24	广州第15次信	咱号泉字货日前已经发完，共计二十四件，约本成银一千三百两
1899.1.5	广州吉次信	又收到祁字吉次一信，贰次正副信二封，统来和、亨两号正副水程四页，遵式采办，至祈勿念
1899.1.19	广州第2次信	昨接咱禹会十五、六次信两封，并统来春会正副水程、存货摺各一页
1899.2.22	广州第3次信	咱南北两会之货，照水程以办八九，所未办到者，仍是难以下手，非无即贵，即难望其廉也

资料来源：据刘建民主编的《晋商史料集成》第11册第214—366页资料整理。

说明：表中时间为农历。在山西药号经营过程中，总分号之间通过寄送信件来报告行情、发布命令等，总号与每家分号来往信会单独编号。分号间也会互通书信，每家分号与其它分号来往书信也需编列序号。

8日广庆和广州分号称已收到祁州分号所寄正副水程4页,8月1日又称已收到禹州分号寄来冬会水程1页。冬会采购结束后随即启动春会水程寄送,1898年11月4日广庆和广州分号收到总号寄来百泉药会水程,1899年1月5日收到广庆和、广庆亨两家祁州分号正副水程4页,1月19日收到广庆和禹州分号所寄正副水程1页。销售端按祁、禹冬春药会时节寄送水程用于指导采购端活动,从而保证预期业务精准开展。

山西药号在制定水程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两个方面情况。其一是宏观层面销售地区的民生情况。如1898年5月24日广庆和广州分号称“闻及山东、直省两境麦苗旱坏,秋禾未种,至于初春之生意尽靠此两省消照,该之不幸,焉得望好?故而咱两会之货亦未预办可也。”^④两会是指祁、禹药会。干旱导致减产最终传导至商业,因此,广庆和广州分号建议祁、禹冬会所需药材应谨慎缓办。

其二是往届药会情形、库存、市场份额等因素。1898年8月1日广庆和广州分号写到:

敬启者,……内云禹会货途阻之情,诚然天使,非人力之所能为也。所南货水程一节,遵命照办,至于各样货色,焉能了草肆意?惟悉遇及何货缺乏之际,则可勉强减办而已,然而价值亦不能受,彼之期也如是,则一不贪,岂不误会上应酬门市哉?亦系仆等之拙见,是乎否乎,听命而行。^⑤

信中首先提到当年禹州春会销售受阻主要原因在于天灾导致市场低迷,又与禹州分号所寄水程“了草肆意”有关,暗含指责之意。其后广庆和广州分号着重讲述采购经验,第一是要关注库存,明确“何货缺乏”时方可采办;第二是要占领市场份额,即便“价值亦不能受”(指利润减少甚至赔累)也要采购来“应酬门市”以维持市场地位。另,上文1898年5月24日广庆和广州分号信中因春会销售惨淡建议冬会采购缓办,说明往届药会的销售情况具有参考价值。此外,销售端负责人受经营能力限制,有时并不能作出正确判断,这就需要在具体采购过程中加以完善。

(二)山西药号广州、香港分号根据水程执行采购任务

山西药号广州、香港分号作为采购端,在接收水

程照单采办过程中,首先需要面临药材品种众多带来的行情起伏问题,1920年直隶实业厅称山西药号从穗港贩至安国的药材有109种,其中广东所产者59种,海外所产者18种,闽、滇、苏等省所产者32种。^⑥穗港药市中的洋广药材供应错综复杂,采购难度大,山西药号广州分号往往处于低利润甚至亏损的窘境。1898年6月8日广庆和广州分号称“广升远买到保安泰王头各1箱,……照今春祁会之市,难以望利也”,1899年2月22日再次汇报“……硃薯花昨日到货1件,咱帮大众俱不敢贪,即是办去亦难望利也”。^⑦这便是前文“价格亦不能受”所讲的情况,药品价格已然倒挂但为应酬门市又不可不买。笔者推测山西药号采用了局部亏损、总体盈利的采购策略,即以多数药品的利润,抵销少数药品价格过高所产生的亏损,从而保证洋广药材运销整体获利。

其次是要面临与其它药帮竞争的问题。广州大宗药材交易常以“开盘”拍卖方式进行,一般由货栈牙商召集买卖双方竞价交易。^⑧解放前广州曾有谭德成等30余家南北行经纪。^⑨1898年7月6日广庆和广州分号称“珍聚要价艾片四百四元,……咱帮皆不要货。弗料被杜盛兴昨日已经买,开市艾片四百三十五元,我帮不肯循盘。”^⑩所谓“循盘”是指跟盘购买,属于使用“开盘”即团购方式获取药品。山西药号原想低价拿货,然而被怀庆帮杜盛兴抢先购买,山西药号不愿跟盘,只好继续观望。^⑪1898年12月24日广庆和广州分号再次提到“果皮现市,……兼因各店家标盘抢买,故而将市提高,……明春宁波、上海帮不办,有掉无涨矣。”^⑫宁波帮、上海帮等药帮抢购造成果皮价格上升,由于竞争造成的市场波动,十分考验山西药号采购端的工作经验。

山西药号广州分号完成采购任务后,还要在会计上形成专项采购账目,并寄给总号及销售端分号作为参考。如表3所示,1898年10月16日广庆和广州分号称“咱号南北两会货,日前业已办毕……至于结账,亦皆分寄各处矣”,至此冬会采购基本结束。1899年2月22日广庆和广州分号称“南北两会之货,照水程以办八九”,预计3月初春会采办亦将结束。其余山西药号的采购节奏基本相同,1898年10月28日广庆和天津分号提到永春原“前后三帮共来广货

一百六十二件”药材运至天津。^⑤山西药号冬春药会采购各用时4个月左右,且都以满足祁、禹等地冬春药会需求为主。

山西药号广州分号每年6月至10月间筹备祁州、禹州冬会及天津所需药货,11月至来年2月底3月初筹备百泉、祁州、禹州春会所需药货,从而形成洋广药材采购流程循环(每次循环都包括冬会、春会两次采购过程)。广州分号相应的账本也随之设置,一次循环又称为账年,每次采购循环行程结束之日,也即是账年起止之时,起止点应在3月至5月间。如广全聚广州分号账本记账时间自1925年4月6日至1926年3月27日,广升远广州分号记账时间是1930年4月5日至1931年4月6日,两家广州分号都将3月底至4月初作为账年起止点可以证明本文判断。^⑥从山西药号广州分号账年习惯来看,这种以祁、禹药市为中心的采购活动一直持续至20世纪30年代。

1937年七七事变后,广升远、广全聚、广益亿等山西药号祁州分号纷纷迁往天津避难。^⑦祁州药会被迫停止,禹州、百泉、樟树镇等药市也因抗战而迅速衰落,民国后期全国性药市相继转移至天津、上海、西安等大都市。^⑧1946年广升远、广全聚在北方设置天津、北京、西安、济南、禹州分号,说明山西药号的经营战略已从以传统药市为中心,转向供应天津、北京等近代化城市。^⑨这种转变受战争催化的表现最为直接,背后深层原因则是交通的变革。

三、山西药号的洋广药材运输方式

清代前中期,山西药号的洋广药材运输路线主要包括赣江一大运河商道与沿海海运两种。乾隆年间自韶州府北上赣江一大运河一线的榷关,如太平关、赣关、西新关、以及运河诸关,税则中基本都有佛手、香椽、速香、檀香、樟脑、槟榔、苏木、木香等香料药材税收明细,西新关、淮安关、临清关、崇文门杂货税则中香料类更是有广木香,直接反映了洋广药材沿赣江一大运河商道北上的史实。^⑩《禹县文史资料》中提及“东南路苏、皖、闽、赣、诸省及西洋、南洋诸国进口药材,几经转运,顺安徽蚌埠、界首水运至周口,再转陆运入禹”^⑪与诸榷关税则史料结合,可以证实清前中期各地药商自运河转淮河,途经凤阳关

水运至周口,再由陆路转至禹州药市的运输过程。自运河至祁州则以天津为转运点,“山陕帮等之药材,亦经天津至流罗,复陆行二十里而达祁州”。^⑫

此外,自广州至华北还有两条水陆联运路线,其一是经赣江水运至九江,溯长江达汉口,北上经樊城到达赊旗镇,再起岸陆运至禹州,山西茶商所著《行商遗要》记载经汉口至赊旗镇,再向北有西、东路之分,发“东口路:花园、柳园口、兰仪、襄县、北舞渡、禹州牛马车俱加秤规,惟禹州药材加五秤规”。^⑬其二是自韶州府经骑田岭进入湖南,走湘江至汉口,北上经赊旗镇到达禹州,乾隆年间两广总督李侍尧称韶州府太平关“一出南雄,一通湖广……出关货物以檀香、铅、锡等项为多”,^⑭道光二十二年晋商茂盛德记从中湘一带购入120捆苏木等,经汉口运抵赊旗镇、周口,就是选择了途经湘江的商道。^⑮

以上三条内地水陆联运路线的运输规模各有变化,首先是乾嘉年间运河淤塞日益严重而海运日渐兴盛,清中叶国内商品流通已经形成沿海、长江、运河三分天下的运输格局,并且长江、沿海的重要性不断上升。^⑯道光年间太谷广升聚在汉口设置分号采购南药也与运河式微不无关系。^⑰其次是咸同年间,太平军截断赣江北上商道,导致江西的运输地位一落千丈,湘江大有替代赣江之势,至民国时期粤汉铁路也是途经湖南。^⑱总之,经历运河淤塞与咸同兵燹,同光时期,洋广药材的内地水陆联运路线主要是经汉口、赊旗镇转运禹州、山西。

在内地运输路线变化之时,沿海海运一直呈现扩张态势。康熙开海后,闽粤洋船已航运至天津贸易。^⑲雍正九年(1731)天津关进口闽船所载商品有苏木、胡椒、槟榔、佛手、陈皮、麦冬等洋广药材。^⑳邓亦兵提到清代前中期沿海运输业已经相对成熟,出现自有、雇佣等多种运输经营方式。^㉑姚暘还提及因海盗阻隔与江南沙船业兴盛,清中后期闽越商船往往以上海为中转地,雇佣沙船改运天津。^㉒乾隆年间,江海关杂货税则载有“广木香”以及大量香药,^㉓进一步证明上海是大宗洋广药材的分流地。故而笔者推测清前中期山西药号的洋广药材海运路线是自广州经上海转运天津,并且这一运输习惯一直延续至轮船时代。

19世纪70年代以后,太古轮船公司、怡和轮船公司先后成立并迅速垄断沿海航运。轮船运输更加便捷,山西药号愈发倚重海运,先将洋广药材海运至天津、烟台,再由天津分号转运祁州成为主要运输方式。1898年广庆和天津分号相继在8月28日“收到津字货一十三件,祁字和、亨两号货共卅件,业已转运祁会”、9月22日“由广陆续来到祁字二号之货共七十八件,俱已装船发运祁州也”、10月10日“前后共收到广来祁字货二百廿二件俱已装船发运祁州也”。^⑧至此,广庆和、广庆亨所属天津至祁州段冬会运输任务基本结束。

除天津外,山西药号的天津分号还在烟台派驻接货人,专门负责向祁州方向转运。1898年8月28日广庆和天津分号接烟台成和昌来信“报及咱两号卸烟之货,共计二百四十三件”,两号是指广庆和、广庆亨。^⑨9月10日广庆和天津分号称“大众之货尚未往大山发完,待别号接货人由烟回津便知详细”,大山是指烟台,“别号”说明其余山西药号也以烟台作为中转地。10月4日广庆和天津分号称“昨接大山骏声宅来信,报到咱两号头条船所到之货二百余件已及往祁州发完”。^⑩至此广庆和、广庆亨所属烟台至祁州段运输任务也基本完成。

在海运过程中,山西药号天津分号具有一定人事安排权力,天津至祁州段运输由天津分号直接负责,烟台至祁州段则由天津分号所派接货人具体操办,天津分号在洋广药材运销体系当中的定位为中转。

随着20世纪初期国内出现铁路修建热潮,内陆运输方式发生重大转变。轮船与铁路运输交汇处的商埠成为交通要地。从汉口运至禹州的路线改由乘

京汉铁路在信阳转车,1902年禹州知州曹广权称“洋货……近闻改由(汉口)火车至信阳又雇小车至禹”。^⑪青岛也因胶济铁路建成,迅速取代烟台成为山西药号运输洋广药材的重要接货地。

如表4所示,1930年2月至1931年4月,广升远广州分号先后委托乾元号、远大号、同发安等报关行代缴洋关税、常关税、厘金、保险、运费等费用,^⑫并由其寻找太古洋行旗下中国航运公司所属轮船进行运输。青岛接货次数远超其它商埠,济南则成为从青岛内运主要目的地。济南上升成为山西药号布局近代化城市的着力点之一。1910年至1920年永春原派驻人员常驻济南,从青岛接收进口药材及广货,转运祁州、禹州及山西等地,1935年广全聚、广升远也在济南设立药栈。^⑬1946年广升远济南分号通过津浦铁路将所接收洋广药材运至天津。^⑭

祁州与外界交通除天津外,也可通过定州中转,1925年5月14日广全聚广州分号“寄定转祁茯苓片5件”。^⑮1935年赵嫡黄称祁州药市“其产品之出于四川及长江流域各省者,则由平汉及津浦两路而达,出于闽、广、滇、黔等省者,则由水路经天津而达”。^⑯1936年粤汉铁路通车后与京汉铁路连接南北,1946年7月16日广升远禹州分号称“粤汉全线已正式通车,汉平车通彰德,嗣后对于广货运禹一事大约可有希望”,9月29日再称“现在往港发货……或由禹装郑州经陇海路运申”。^⑰说明广州、上海分别可通过粤汉铁路、陇海铁路、津浦铁路转车前往禹州。

轮船、铁路运输先后重塑了山西药号的洋广药材运输过程。自广州海运至天津、青岛、上海、汉口等交通枢纽,再通过铁路转车至祁、禹;或自广州经粤汉、京汉铁路倒车至祁、禹成为山西药号运输洋广

表4 1930—1931年广升远驻广州分号所购洋广药材运输表

报关行/运输公司	出发地	托运方	目的地						承揽总次数
			青岛	天津	汉口	济南	香港	上海	
乾元号	广州	中国航运公司	7次	3次	8次			6次	24次
同发安	广州	中国航运公司	17次						17次
远大号	广州	中国航运公司		1次	1次				2次
悦来公司	青岛	胶济铁路				14次	2次	1次	17次
华通公司	青岛	胶济铁路				25次	3次		28次

资料来源:刘建民主编的《晋商史料集成》第41册第232—300页。

药材的主要方式。

总体来看,山西药号的洋广药材运输方式与路线经历了三次重大变化,第一次是注重赣江一大运河商道,运河路线废弃后,内地水陆联运改以经汉口、赊旗镇至禹州路线为主;第二次是同光之际洋轮运输兴起,山西药号更为注重天津、烟台的转运地位,1898年广庆和、亨为祁会准备的洋广药材采购成本是禹会的6倍,如表3所示,祁会用银21525.32两、禹会用银3483.46两、天津用银306.42两,祁会货物自然从天津、烟台转输;第三次则是20世纪初期铁路与海运联合,加强天津、青岛地位的同时,济南也成为山西药号的洋广药材内陆运输重要中转站。

四、山西药号的洋广药材销售过程

晚清民国时期,山西药号的洋广药材销售长期保持以分号为主导的局面,其发展过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以传统药会为中心阶段,其二是自1937年至1952年以天津、北京等近代化城市为主阶段。

(一)以传统药会为中心阶段

清中期以后,祁州、禹州、百泉等商镇相继发展成为全国性药市,并形成季节性药会。^⑨经营洋广药材的山西药号也同时扩大规模,同光年间禹州已有“洋广药材公和社”,清末民初祁州出现山西“广帮”,禹州“行销以粤、蜀、甘、秦、晋等省为最多”,销售市场覆盖范围扩大也应对山西药号的洋广药材贩运起到激励作用。^⑩以上都表明山西药号在祁州、禹州的洋广药材经营已相对成熟。

1898年10月中下旬山西药号基本完成采购运输,相继进入销售过程,此时正值祁、禹冬会开始之际。^⑪广庆和禹州分号最先售卖,早在9月26日便称“咱禹会刻今共售洋货值银3000余两”,10月20日祁州分号称“刻下各路买客才显露头”,12月4日祁州分号称“会事已毕,和记共售直银一万八千七百余两,连黄连在内;亨记共直银一万三千七百余两”,12月11日禹州分号亦称“刻下禹冬会约已完竣,咱拥下期现共售洋货直银七千两之谱”。^⑫结合表3来看,广庆和祁州分号所售洋广药材采购成本11255.82两,连带黄连共销售18700余两;广庆亨祁州分号采购成本10269.05两,销售收入13700余两,获取毛利润

3430.95两;广庆和禹州分号采购成本3483.46两,销售收入7000两,获取毛利润3516.54两。广庆和、广庆亨在祁、禹会销售时间分别持续40余天、70余天。

1898年冬会期间,广庆和的洋广药材销售收入主要来自祁会,在禹会收入仅占祁会的21.6%。1899年春会资料有限,但从表3所示广庆和寄祁、禹春会水程与冬会水程页数相同(分别是4页、1页),以及百泉春会采购成本仅有1300两来看,笔者推测广庆和、广庆亨春会收入应与冬会规模相似,且依旧保持祁会最多、禹会次之、百泉再次的局面。其余山西药号也基本类似,如广聚盛在1919年为祁冬会采购药货花费53573.04两,在1920年为祁春会采购药货花费38770.29两,然而不见其参与禹会的情形。^⑬结合前文,其中缘由应当与交通格局变迁及内地营业环境恶化有关。

山西药号的洋广药材销售过程也需牙商参与,1932年天津《益世报》报道称祁州药市“各货均须由居间人成说,名曰牙纪”。^⑭1934年8月至1937年7月,广升达、广升裕、永春原、晋茂长、广益亿等9家山西药号祁州分号共出售256货次,销售对象主要是祁州帮、北平帮、天津帮、山东帮、彰德帮、口帮、营口帮,以及石家庄客、唐山客、宣化客、太原客、郑县客、西口客、包头客等23地药客,其中祁州帮、天津帮以及河北各府县药客购买频次最多。^⑮以上众药商作为山西药号贩运链条下的“接力选手”,其交易行径十分清晰地反映了洋广药材从祁州药市到京、津、冀、河南、山东、关东、西北等广大北方地区的流动,之后则进入各府县的药业批零兼营环节。

(二)以天津、北京等近代化城市为主阶段

20世纪30年代初天津成为北方中心市场,以港口为点、铁路为线的外向型经济格局取代传统商业模式,祁州、禹州药市受到巨大挑战。^⑯抗战时期,祁州、禹州冬春药会无法正常进行,山西药号祁州分号纷纷向天津、北京等地转移,1938年广全聚祁州分号移往北京并改称广晋通,^⑰1941年广升远将天津、北京分号各改称义丰泰、义丰庆,^⑱以此来隐藏经营规模,实际仍是分号,并服从总号指令。山西药号广州、香港分号也从供应药会转向满足天津、北京等近代化城市为主。1946年12月17日广升远香港分号

致总号信中提及：

广将各处货账经已结楚，计津泰记共办货五十七件、邮包十九件，除论留用实洋三千零九十六万二千二百五十四元；北平广寄共货十件、邮包六件，除论留用实大洋七百六十万四千三百四十七元；济字共货三十二件邮包，除论留用实洋一百二十二万九千一百七十元；禹字邮包一件，用实洋一百三十六万五千元；谷铺共办丸药十二件、邮包五件，除论留用实洋五百二十三万六千九百六十六元零八分元，今随统上买货总结折一个，至祈复核注账。^⑧

1946年年底广升远香港分号汇总全年采购数量，与各处结清采购账目，并形成买货总结折寄送总号，要求总号复核注账，表示已完成采购任务。从引文来看，广升远香港分号所办洋广药材主要运往天津、北京、太谷、禹州、济南。天津义丰泰记所需药货规模最大，使用法币30962254元，与其余分号相比，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天津分号的定位已从中转端改为销售端，也说明市场重心从传统药市向近代化城市转移趋势基本完成。

山西药号的洋广药材运销任务长期由分号承担，并贡献了绝大部分利润。南采北售循环起先以祁州、禹州等传统药市为重心，之后转由天津等近代化城市作为市场重心。总号虽也有销售份额，如1896年广升远总号在晋中东路销售收入591.24两镜宝银，^⑨数额较小。1898年广庆和总号驻地太谷是祁州、禹州的次一级批发市场，所售洋广药材主要经祁州、禹州分号寄送。^⑩1946年广升远总号所需药材采购成本5236966.08元，也远低于分号经营规模。

山西药号运销体系实际都是在以总号为中枢的经营制度框架内运转。洋广药材市场重心的转移也应属于总号权力范畴，称为市场调整。山西药号采购端、销售端分号参与洋广药材运销过程中各自所记货流帐、银流帐也有对应相等关系，广庆和将采购账目分寄各处，广升远总号能够“复核注账”便是因为总号掌握各地分号账本，拥有会计监督权。换言之，总号的定位在于提供制度支持，以及资金管理，具体表现为运销时节提前拨付采购资金，事后统管销售收入。

五、山西药号经营洋广药材过程中的资金管理

晚清民国时期，山西药号在为经营各类业务建立分支机构的同时，也制定了相对集中的资金管理制度，总号作为中枢要求各地分号遵循收支两条线原则，不许坐收坐支。具体到洋广药材经营上，采购端分号所需采购资金由总号拨付，其在穗港销售收入不可用于采购支出；而销售端分号所得销售收入全由总号统管，其采购支出则由总号另外拨付，从而实现总号对运营资金的统一管理。

(一) 拨付采购资金

在以传统药会为中心阶段，山西药号总号的资金拨付与广州分号采购行程开始时间前后相继。1898年6月8日广庆和广州分号称总号“由协成乾汇来银一万两”，表3显示祁会、禹会水程也相继在6月8日和8月1日寄至；冬会采购结束春会筹备之初，12月15日广庆和总号委托“协成乾由谷电汇来银一万零六百八十两”。^⑪

除总号直接拨付的资金外，分号还可对外借贷，但债务必须由总号清偿，这种做法本质属于总号超前拨款。1898年7月6日广庆和广州分号向广源兴广州分号借“售茸银三千两，咱在谷本冬标期交伊”，向协成乾借“谷明春标期银六千两”，最后由广庆和总号分别在1898年冬标和1899年春标还款。^⑫再加上1898年6月8日由总号汇集的1万两，1898年冬会采购之初，广庆和广州分号已有资金19000两，为广庆和祁州、禹州、天津分号采购花费成本实银共15045.7两，仍剩近4000两。11月底12月初广庆和广州分号先后借到协成乾6000两、5000两，再由广庆和总号分别在1899年夏标和秋标归还。再加上1898年12月15日由总号汇来的10680两，筹备1899年春会时，广庆和广州分号已有21680两。

先由分号举债，再由总号还款的资金筹集方式在山西药号内部普遍使用，并且以广州收汇、太谷等总号驻地交汇的汇兑形式存在。如1898年12月14日广庆和广州分号致总号信中所示：

昨日远记收汇乾记银一万两，每一千两补用主水银六十八两，在广腊月廿一日收，期至谷明夏标交伊。……翌日蔚记又做开谷明秋标期盘，每一千两补用主水银五十八两，该号用一万

五千两，懋记随盘又用三千两，万盛高用五千两，万胜顺用三千两，咱号亦随盘用五千两。在广腊月廿八交期，平色照旧至祈注底，与伊立去凭信壹封，到期交银缴信为荷。^⑧

1898年12月13日广升远广州分号与广州协成乾之间达成汇兑协议，由广升远广州分号收汇广州协成乾银10000两，再由广升远总号在1899年太谷夏标交汇至太谷协成乾，每千两汇水68两。12月15日广升蔚广州分号“做开谷明秋标期盘”主动招揽汇兑，广恒懋、万盛高、万胜顺、广庆和广州分号都参与了这次汇兑，1899年太谷秋标到期之时再由各总号交汇。此时正值祁、禹春会采购开始之际，所得银两必将用于采购，承担汇兑业务同时借取银两，性质上应属于借贷，故称之为“汇借”。而且山西药号广州分号已发展出汇借金融市场，称为“做某标期盘”。

汇借是长途贩运或跨区域经营的产物，属于异地借贷的进一步发展。^⑨对于票号而言，实际就是将汇兑与存放款业务相结合，黄鉴晖在介绍票号逆汇时提到“乙地先付款，甲地后收款，是放款与汇兑的结合”，如协成乾的广州分号先出借，太谷总号再收回，体现了票号各分号间调拨头存的需要，以及“酌盈济虚、抽疲转快”的经营方针，并且借贷主客双方都要按汇费和利息行市，各自为对方交付汇费和利息。^⑩

利息的支付主要是通过赔补银两色差。1913年广升远总号称“旧年汇银系995色”，^⑪即镜宝银995与广州番银92比兑。票号自广州向太谷汇银每千两汇水仅平色便需75.4两，而上引文所示广升远、广升蔚都以低于75.4两的汇水承揽汇兑，低于票号汇水部分自然由其赔补，变相承担了一定利息。通过汇借，票号得以将银两汇回太谷并减少银色损失，山西药号广州分号则获得一定期限银两使用权。从广升远、广升蔚等的金融活动来看，票号是山西药号资金链中的重要一环，总号汇兑由票号承揽，分号借款也以票号为主要来源，票号已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山西药号的资金命脉。

民国初期，营业环境动荡导致票号大面积歇业，1913年广升远总号称“广东汇票行十来家全为撤庄，唯留百川通、协成乾二家，在广往后汇银难办”。山

西药号依赖票号进行融资的模式大受冲击。山西药号总号与广州分号直接汇款的方式，也改为经由上海中转。1917年9月广升远总号称协成乾在太谷交给三晋源申公砒宝银4000两，之后在上海向三晋源收规银4100两整，再由广州协成乾交给广升远、广全聚广州分号各2050两。上海金融中心的作用越发凸显，山西药号广州分号汇借资金的方向也由汇往总号改为汇往上海，1921年广升远广州分号分别在7月、10月称其将大盛川的银两汇往上海，接着写道：“届期掉广可也……待何时掉广再为详报”。^⑫山西药号总号向申汇银再转至穗，广州分号也在承揽自穗至申汇兑借款，双方的资金、债务都向上海集中，笔者推测结算环节也应当发生在上海。山西药号正处于融入上海金融体系的阶段。

民国中后期票号倒闭殆尽，山西药号的资金管理新变化是成立账庄。20世纪30年代广全聚成立天聚公账庄、万安利账庄，用于保障办货资金充裕。^⑬1941年广升远总号在广州成立丽通川账庄，其万金账序言中称“至于股本原为辅助大柜而成，只准出放远记，不许外放”。^⑭账庄是山西药号继借助票号借贷之后筹建资金链的一次尝试，在持续供给广州分号采购资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47年广升远资方要求解散账庄瓜分存款，致使各地分号有货无款纷纷陷于瘫痪状态，^⑮洋广药材经营实际已陷于停滞。

(二)统管销售收入

山西药号总号通过统管销售端分号账目便可控制销售收入。1898年12月11日禹会结束，广庆和禹州分号便将“账目归结清楚”，并派遣伙友于12月20日“由禹动身带结帐回铺”。山西药号采购端分号账目早在采购行程结束之际已分寄各处，总号通过对比销售端与采购端账目便可完成内部控制。其后销售端分号等待太谷标期之时再将收入汇回太谷，交由总号清销债务。1898年11月22日祁州冬会即将结束，广庆和祁州分号向总号报告称“至此两号银项，除汇谷明春标期，约余二三千金，将来初月初间，咱伙带回现银二千来两之谱，预为报知”。^⑯广庆和、广庆亨祁州分号在太谷春标时汇回银两，与前文所述广庆和广州分号汇借而总号按标期还款相互印

证,说明太谷标期是山西药号结算环节。1896年广升远总号便在太谷春标期间结算晋中东路各药号所欠债务。^⑩

山西药号总号一般在标期将收入收回,^⑪为防止标期发生违约事件,也会命令销售端分号预先将部分现银运回。1898年12月1日广庆和祁州分号致总号信中称:“以目下划算,春标汇项尚未顶真,比去年准少,三二日内着伙先为送回现标四千两上下之数,远至十四五日到谷。”^⑫顶真即为顶标,意指无法按标期还款,说明广庆和总号预判1899年太谷春标必然发生顶标毁约事件,广庆和祁州分号虽预估顶标较去年准少,但也立刻制定现银运送计划,派遣伙友延吉于12月4日“押送亨记庚辛四件回谷,共计祁药平宝银四千五百一十六两二六”。^⑬庚辛是银两代称,此次运现共计祁药平宝银4516.26两,所余部分则通过太谷标期汇回结算。其它山西药号总号也基本遵循标期结算制度,由此可见,山西药号构建了洋广药材运销过程中以总号作为结算中心的资金循环体系。

(三)收支两条线资金管理制度

山西药号每一分号的支出、收入都需经总号核算,笔者将其归纳为收支两条线原则。对于每一分号,收支分离的前提是与其它分号配合组建“代购、代销”体系,如此采购端与销售端账目才能相互监督。如山西药号广州分号采购洋广药材的同时,也在穗港销售天津等分号送来的药材,1899年2月22日广庆和广州分号称“咱与广两帮大众鹿茸,昨日平安抵广”,即是山西帮药号与广东帮药号将鹿茸运至广州。^⑭山西药号甚至以参茸闻名穗城,被称为“山西行”。^⑮货物与资金呈反方向运动,双向药货采销业务自然产生双向收支调动,否则无法构成业务循环。

1920年广聚盛总号所属《民国八年银钱往来账》关于广州分号的记账条目有“庚申春会取买货成本……、又取应缴费银……、又取伙捐物银……,收售祁来货……,总共除收净用……”。^⑯广聚盛广州分号的支出、收入分开记载,“春会取买货成本”即是采购支出,“收售祁来货”便是销售收入,由总号结算说明收支都已被总号统管。结合广庆和、广聚盛

经营过程可知,对于广州分号而言,总号拨付洋广药材采购资金,统管其鹿茸销售收入;对于天津分号而言,总号统管洋广药材销售收入,拨付资金要求其为广州分号供应鹿茸。山西药号的每一种药品贩运都有采购端与销售端账目对应,保证双方不会自买自卖、坐收坐支。总号遂对每一分号都能施行收支两条线的管理办法,保证总号控制分号资金调动。这一管理办法至少可追溯至道光年间广升聚建立总分号体系阶段。

山西药号作为一个组织,每一分号都必须服从总号所赋予的定位,和采购、运输与销售等各类职能。每一分号所销售药货都由其它分号送来,同时也为其它分号采购药品;每一分号在业务上不可在驻地自买自卖,在会计上不可坐收坐支。每一分号都遵循收支两条线,并通过与其它分号配合方便各类药品的贩运、销售业务得以开展。众分号之间业务不可分割,总号作为资金结算中心统管分号资金收支,再辅以人事安排等管理制度,这便是山西药号总分号结构运转的主要特点。

六、余论

明清时期,药材成为长途贸易中的重要商品,药材贩运商也早已突破经营土产的限制,发展成职业商人。至道光年间,山西药号已经建立了相对成熟的以总号为中枢的资金管理、人事安排、会计监督等经营管理制度,保证分号听命于总号,并履行其职能,建立了以分号作为经营主体,按传统药会冬春两季交易习惯执行采购、运输、销售任务的洋广药材运销体系。

山西药号的洋广药材采购任务起初由广州分号负责,其后添设香港分号一同作为采购端;运输过程由天津、济南分号等中转端负责;销售环节前后出现了以祁州、禹州分号为中心和以天津、北京分号等城市为主两个阶段,与此同时,山西药号的洋广药材市场重心出现了从传统药市向近代化城市转移的发展趋势。

山西药号的洋广药材运销任务长期由分号具体承担,而总号的职能定位在于提供制度支持,其核心制度是资金管理,具体表现为要求每一分号都施行收支两条线原则,由总号拨付采购资金并统管销售

收入。总号已具有一定预算功能,拨付采购资金时间与广州分号接收水程时间前后相继,而且允许分号拥有一定融资权力,可以承揽票号银两汇兑业务,再由总号按标期还款,从而获取银两一定期限的使用权。洋广药材销售结束后,总号通过统管销售端分号账目便可达成控制销售收入的目的,其后按标期结算债务,从而完成资金管理循环。

山西药号的洋广药材经营方式可归纳为货款分离,又可称分号经营、总号结算,货款分离意味着分号作为运营主体直面市场,总号作为资金结算中心实现财权控制。以总号为中枢的经营制度,以传统药会为中心的经营战略,以及较大的经营规模,足可代表传统企业发展的高度。笔者认为,从人事、会计等制度层面理解每一家商号的制度创造,从业务层面探索每一行业的运营惯习,必将成为企业史、商业史研究新路径,也可以开拓明清长途贸易研究新领域。

由衷感谢匿名审稿人所提意见。

注释:

①唐宋年间中原地区多将岭南运来的海外药材称广药或香药,明清时期“川广云贵”有四大道地药材产地之名,广药大量进入贸易行列,国内遂将自广东进口内运及两广所产药品合称为洋广药材,又简称为广药。参见郑洪主编:《岭南医学与文化》,广东科技出版社2009年版,第352—377页。

②唐廷猷:《中国药业史》,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3年版,第153—158页。

③许檀:《清代晋商在禹州的经营活动——兼论禹州药市的发展脉络》,《史学集刊》2020年第1期。

④郑合成:《安国县药市调查》,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宗教民俗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页。

⑤赵燊黄著,樊菊芬点校:《祁州药志》,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5页。

⑥河北省安国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安国县文史资料》第1辑,1988年印行,第67—73页。

⑦参见中共太谷县委调查研究室、中共广誉远药厂委员

会编印:《广誉远药厂史》,1960年印行。

⑧山西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山西商人的生财之道》,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1—48页。

⑨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等编:《晋商史料全览·字号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6—216页。

⑩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等编:《晋商史料全览·晋中卷》,第628—637页。

⑪禹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禹州文史资料》第6辑,1990年印行,第159页。宁方忠称祁州有7家“广帮”,参见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5—131页。

⑫负德政曾结合碑刻资料探讨广升远等药号经营事迹,参见负德政、杨杰:《山西商号在粤经营事迹考略》,《肇庆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其余研究多从中华老字号等文化领域入手,本文不再一一列举。

⑬王学坤:《清代民国太谷药业字号经营研究——以广升远信稿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2020年;刘新龙:《晚清太谷药商广升远药材经营研究——以〈光绪二十二年广升远记东路走账〉为中心》,《史志学刊》2021年第3期。

⑭徐德志等编:《广东对外经济贸易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43页。

⑮何绪军:《明清时期广东药材的分布与贸易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18年。

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史研究室等编:《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9页。

⑰胡世林主编:《中国道地药材》,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199页。

⑱郑若曾撰,李致忠点校:《筹海图编》卷12《行保甲》,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31页。

⑲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1册,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05—307页。

⑳孙彦春主编:《禹州中药志》,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167、245页。

㉑中共太谷县委调查研究室、中共广誉远药厂委员会编印:《广誉远药厂史》,第11页。转引自负德政、杨杰:《山西商号在粤经营事迹考略》,《肇庆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㉒孙彦春主编:《禹州中药志》,第265页。

- ⑳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史研究室等编:《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第152页。
- ㉑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编:《晋商史料全览·晋中卷》,第630页。
- ㉒高春平主编:《国外珍藏晋商资料汇编》第1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49—254页。
- ㉓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山西文史资料》第109辑,1997年印行,第149页。
- ㉔许檀:《清代河南、山东等省商人会馆碑刻资料选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27—485页。
- ㉕唐廷猷:《中国药业史》,第352页。
- ㉖张晓辉:《香港近代经济史(1840—1949)》,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5、154页。
- ㉗中共太谷县委调查研究室、中共广誉远药厂委员会编印:《广誉远药厂史》,第22页。转引自负德政、杨杰:《山西商号在粤经营事迹考略》,《肇庆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 ㉘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11册,第216、337页。
- ㉙王学坤:《清代民国太谷药业字号经营研究——以广升远信稿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2020年。
- ㉚李茂盛:《孔祥熙私人资本初探》,《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李茂盛:《孔祥熙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99页。
- ㉛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山西文史资料》第114辑,2000年印行,第614页。
- ㉜张正明等编:《明清晋商商业资料选编》,山西经济出版社2016年版,第531—544页。
- ㉝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山西文史资料》第11辑,1965年印行,第856—857页。
- ㉞朱绍祖:《明清至民国禹州“药都”的形成与地域社会变迁》,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19年。
- ㉟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25—131页。
- ㊱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11册,第657页。
- ㊲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编:《晋商史料全览·字号卷》,第630页。
- ㊳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11册,第219—220页。
- ㊴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11册,第239页。
- ㊵郑合成:《安国县药市调查》,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宗教民俗卷》,第191页。
- ㊶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11册,第224、353页。
- ㊷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广州文史资料》第25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4页。
- ㊸沈英森主编:《岭南中医》,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 ㊹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11册,第229页。
- ㊺河南省博爱县政协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印:《博爱文史资料》第5辑,1990年印行,第32—34页。
- ㊻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11册,第327页。
- ㊼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11册,第288页。“前后三帮”指前后共有三大批次药材。
- ㊽《民国十四年四月广全聚药铺银钱往来账》《民国十九年正月广升远记船脚厘金杂使账》分别属于广全聚、广升远广州分号所有,参见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41册,第219、300页;第42册,第547、590页。
- ㊾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25—131页。
- ㊿唐廷猷:《中国药业史》,第175页。
- ①王学坤:《清代民国太谷药业字号经营研究——以广升远信稿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2020年。
- ②乾隆《钦定户部则例》第2册,第568、601、611、623、631页;第3册,第646、660、670、686、792页,蝠池书院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
- ③河南省禹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禹县文史资料》第2辑,1986年印行,第50—59页。
- ④赵燊黄:《祁州药志》,第6页。
- ⑤张亚兰编著:《〈行商遗要〉释读与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2018年版,第59—129页。
- ⑥《两广总督李侍尧乾隆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奏折》,转引自许檀:《清代中叶广东的太平关及其商品流通》,《历史档案》2015年第4期。
- ⑦许檀:《清代河南的商业重镇周口——明清时期河南商业城镇的个案考察》,《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
- ⑧许檀:《清代前期流通格局的变化》,《清史研究》1999年第3期。
- ⑨山西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山西商人的生财之道》,第31—48页。

⑬刘云波、李斌编：《湖南经济通史·近代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0、171、287页。

⑭刘正刚：《清代以来广东人在天津的经济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⑮《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9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79年版，转引自许檀：《清代前期的沿海贸易与天津城市的崛起》，《城市史研究》第13—14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90页。

⑯邓亦兵：《清代前期沿海运输业的兴盛》，《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

⑰姚旻：《晚清天津帆船贸易发展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3期。

⑱乾隆《钦定户部则例》第3册，第660页。

⑲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11册，第243、261、276页。

⑳支军：《胶东文化撮要》，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60页。

㉑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11册，第254、271页。

㉒王琴林等纂：《禹县志》，成文出版社1976年版，第402—403页。

㉓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41册，第237页。

㉔济南市卫生局等编印：《济南中医药志》，1989年印行，第233页。

㉕王学坤：《清代民国太谷药业字号经营研究——以广升远信稿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2020年。

㉖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42册，第547页。

㉗赵燊黄：《祁州药志》，第4页。

㉘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11册，第718页。

㉙唐廷猷：《中国药业史》，第153—158页。

㉚刘景向总纂：《河南新志》(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76页。

㉛祁州冬会正期是每年十一月十五、春会正期是每年四月二十八；禹州冬会正期每年十一月二十、春会正期是四月二十日、秋会正期是八月二十日；百泉药会每年举办一次，称四月会。参见郑合成：《安国县药市调查》，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宗教民俗卷》，第154页；禹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禹州文史资料》第6辑，第159页；辉县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印：《辉县文史资料》第1辑，1990年印行，

第100—103页。

㉜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11册，第318页。

㉝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41册，第454页。

㉞《安国药材市场》，《益世报》(天津)1932年6月12日，第7版。

㉟《益世报》(天津)曾在1932年6月12日至1937年7月23日以“安国药业通讯”专题对祁州药市进行了122次报道，其中与山西“广帮”药号相关的报道集中在1934年至1937年，较为重要者是1934年8月20日第7版、1936年11月13日第7版，笔者以一笔药货交易作为一个货次(如“祁帮同德堂买广升裕西砂米，开价八角”即一个货次，“北平帮买广升达机器片，又买正梅片”算两个货次)，统计得山西药号共出售洋广药材256货次。销售对象仅有南京客是南商，其余22个府县客商来自华北地区。

㊱樊如森、姬天舒：《近代北方药品供销体系的构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8卷第2辑(2003年)。

㊲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29页。

㊳山西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山西商人的生财之道》，第31—48页。

㊴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11册，第799—780页。

㊵刘新龙：《晚清太谷药商广升远药材经营研究——以〈光绪二十二年广升远记东路走帐〉为中心》，《史志学刊》2021年第3期。

㊶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11册，第301、362页。

㊷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11册，第324页。

㊸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11册，第230、277、324页。

㊹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11册，第324页。

㊺刘秋根：《中国封建社会资金市场分析——以高利贷资本为中心》，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云南大学历史系编：《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7页。

㊻黄鉴晖：《山西票号史(修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页。

㊼黄鉴晖等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544—545页。

㊽黄鉴晖等编：《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544—545页。

⑨政协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25—131页。

⑩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1册,第711—712页。

⑪山西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山西商人的生财之道》,第38页。

⑫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11册,第307、318、322页。

⑬刘新龙:《晚清太谷药商广升远药材经营研究——以〈光绪二十二年广升远记东路走帐〉为中心》,《史志学刊》2021

年第3期。

⑭孔祥毅:《镖局、标期、标利与北方社会信用研究》,《金融研究》2004年第1期。

⑮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11册,第311页。

⑯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11册,第314页。

⑰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11册,第347、352页。

⑱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广州文史资料》第25辑,第168—212页。

⑲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41册,第454页。

Research on Yangguang Medicinal Materials Management of Shanxi Pharmacist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u Xinlong Liu Qiugen

Abstract: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Shanxi Yaohao focused on the long-distance trade of Yangguang medicinal materials, and weaved an operation network in the form of a general semicolon, and established Yangguang Medicinal Materials Gonghe Society in Yuzhou, which was called "Guangbang" in Qizhou. In the process of operating Yangguang medicinal materials by Shanxi Yaohao, the procurement task was completed by the branches in Guangzhou and Hong Kong; Tianjin, Yantai and Qingdao were successively used as shipping destinations. After the Jiaoji Railway was opened, the branch in Jinan became an important transit for Yangguang medicinal materials by land. At first, the sales tasks were mainly carried out by the semi-colons in Qizhou and Yuzhou, and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economic structure, the semi-colons in Tianjin were responsible. The transportation and sales of Yangguang medicinal materials of Shanxi Yaohao are specifically completed by the semicolon, and the main functions of the head office are personnel arrangement, capital management, accounting supervision and market adjustment. This mode of operation can be summarized as semicolon operation and total number settlement, that is, the semicolon acts as the main body of the operation to face the market, and the total number acts as the capital settlement center to ensure financial control. Semicolon management and total number settlement are the core mechanisms for Shanxi Yaohao to expand the market, and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ing the long-distance trade management system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Shanxi Medicine Number; Yangguang Medicinal Materials Management; Head and Branch Office System; Long-Distance Trafficking